

马克思主义文论选

下 册

吕德申 主编

吕德申 闵开德 李光中
李思孝 黄书雄 董学文 选编

（按姓氏笔划为序）

高等教育出版社

下 册 目 录

第 三 辑

列宁	怎么办？（节录）	（ 2 ）
	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	（ 4 ）
	纪念葛伊甸伯爵（节录）	（ 9 ）
	给阿·马·高尔基（1908年2月7日）（节录）	（ 13 ）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节录）	（ 16 ）
	列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	（ 22 ）
	政论家的短评（节录）	（ 27 ）
	列·尼·托尔斯泰	（ 28 ）
	列·尼·托尔斯泰和现代工人运动	（ 33 ）
	托尔斯泰和无产阶级斗争	（ 36 ）
	列·尼·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	（ 37 ）
	纪念赫尔岑（节录）	（ 41 ）
	欧仁·鲍狄埃	（ 45 ）
	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节录）	（ 47 ）
	给阿·马·高尔基（1913年11月中旬）	（ 52 ）
	给阿·马·高尔基（1913年11月下半月）	（ 56 ）
	俄国工人报刊的历史（节录）	（ 59 ）
	给印涅萨·阿尔曼德（1914年6月5日）	（ 60 ）
	给印涅萨·阿尔曼德（1915年1月24日）（节录） ...	（ 61 ）
	论我们报纸的性质	（ 62 ）
	给阿·马·高尔基（1919年7月31日）	（ 65 ）
	青年团的任务（节录）	（ 68 ）

	论无产阶级文化	(71)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的决议的草稿	(73)
	给米·尼·波克罗夫斯基	(73)
	一本有才气的书	(74)
	论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内外形势 (节录)	(75)
	论纯洁俄罗斯语言	(76)
〔附录〕	蔡特金：《回忆列宁》 (节录)	(77)
斯大林	论东方民族大学的政治任务 (节录)	(83)
	答比里—别洛策尔柯夫斯基 (1929年2月2日) ...	(85)
	致费里克斯·康同志 (1929年7月9日)	(88)
	给阿·马·高尔基的信 (1930年1月17日)	(91)
	给别泽缅斯基同志的信 (1930年3月19日) ...	(94)
	致杰米扬·别德内依同志 (1930年12月12日) ...	(95)
	致苏联电影管理总局舒米亚茨基同志	(100)
	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 (节录)	(101)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节录)	(107)

第 四 辑

卢那察尔斯基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节录)	(112)
高尔基	保尔·魏伦和颓废派	(140)
	年轻的文学及其任务	(156)
	论文学及其他	(162)
	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171)
	论短视和远见	(178)
	苏联的文学 (1934年8月17日在第一次 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节录)	(189)
	给亚·谢·谢尔巴科夫 (1935年2月19日) ...	(196)

第 五 辑

李大钊	俄罗斯文学与革命	(202)
	什么是新文学	(209)
萧楚女	艺术与生活	(211)
瞿秋白	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 (节录)	(214)
	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	(223)
	《鲁迅杂感选集》序言	(238)
鲁 迅	文艺的大众化	(260)
	“ 硬译 ” 与 “ 文学的阶级性 ”	(261)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277)
	我们要批评家	(281)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	(283)
	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	(284)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287)
	致何白涛 (1933年12月19日)	(290)
	答国际文学社问	(291)
	论 “ 旧形式的采用 ”	(29 3)
	拿来主义	(295)
	《木刻纪程》小引	(297)
	门外文谈 (节录)	(299)
	叶紫作《丰收》序	(302)
	什么是 “ 讽刺 ” ？	(304)
	致李桦 (1935年6月16日)	(306)
	白莽作《孩儿塔》序	(308)
冯雪峰	讽刺文学与社会改革	(310)
	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 (节录)	(314)
周 扬	关于 “ 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 漫主义 ”	(326)

《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序言..... (338)

第 六 辑

毛泽东	论鲁迅.....	(354)
	新民主主义论（节录）.....	(356)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369)
	致杨绍萱、齐燕铭（1944年1月9日）.....	(395)
	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	(396)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节录）...	(403)
	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	(408)
周恩来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 的讲话.....	(411)
邓小平	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 上的祝辞.....	(432)
	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	(438)
〔附录〕	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研究部分论文索引.....	(443)

第三辑

列 宁

怎么办？*（节录）

……俄国社会民主党担负着世界上任何一个社会主义政党都还不曾担负过的民族任务。我们在下面还要谈到把全体人民从专制制度压迫下解放出来的这个任务加在我们身上的种种政治责任和组织责任。现在我们只想指出一点，就是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读者如果想要稍微具体地了解这句话的意思，就请回想一下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先驱者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及七十年代的那一群光辉的革命家；就请想想俄国文学现在所获得的世界意义；就请……只要想想这些也就足够了！

……

“应当幻想！”我写了这几个字之后，不觉吃了一惊。我仿佛是坐在“统一代表大会”的会场里，坐在我对面的是《工人事业》杂志的编辑和撰稿人。这时马尔丁诺夫同志站起来，咄咄逼人地向我质问道：“请问，如果不事前向党的各个委员会请示，自主的编辑部有权去幻想吗？”接着，克里切夫斯基同志站了起

* 本书写于1901年秋—1902年2月，1902年3月第一次用单行本刊印。

赫尔岑（1812—1870），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作家。

别林斯基（1811—1848），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文学批评家。

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文学批评家，作家。

来，并且（用哲学家的态度来加深卑已加深了普列汉诺夫同志的意见的马尔丁诺夫同志的意见）更加咄咄逼人地接着说道：“我进一步问你，如果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忘记，照马克思的意见，人类始终只是提出可能实现的任务，没有忘记策略是同党一起发展的党的任务的增长过程，那末从根本上来说，他是不是有权幻想呢？”

想到这种咄咄逼人的问题，我真是不寒而栗，只想找个地方躲起来。我就试试躲在皮萨列夫 背后吧。

皮萨列夫在谈到幻想和现实之间的不一致的问题时写道：“有各种各样的不一致，我的幻想可能赶过事变的自然进程，也可能完全跑到任何事变的自然进程始终达不到的地方。在前一种情形下，幻想是丝毫没有害处的；它甚至能支持和加强劳动者的毅力……这种幻想中并没有任何会败坏或者麻痹劳动力的东西。甚至完全相反。如果一个人完全没有这样来幻想的能力，如果他不能间或跑到前面去，用自己的想象力来给刚刚开始在他手里形成的作品勾画出完美的图景，——那我就真是不能设想，有什么刺激力量会驱使人们在艺术、科学和实际生活方面从事广泛而艰苦的工作，并把它坚持到底……只要幻想的人真正相信自己的幻想，仔细地观察生活，把自己观察的结果与自己的空中楼阁相比较，并且总是认真地努力实现自己的幻想，那末幻想和现实之间的不一致就丝毫没有害处。只要幻想和生活多少有些联系，那幻想决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可惜的是，这样的幻想在我们的运动中未免太少了。对这种情况应当负最主要的责任的，是那些以头脑清醒和“熟悉”“具体情况”自夸的合法的批评家和不合法的“尾巴主义”分子。

《列宁选集》第1卷，第242、378—379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德·伊·皮萨列夫（1840—1868），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唯物主义哲学家，文学评论家。

见受萨烈夫的《幼稚想法的失误》。

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 *

十月革命以后在俄国造成的社会民主党工作的新条件，使党的文学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非法报刊和合法报刊的区别，这个农奴制专制俄国时代的可悲的遗迹，正在开始消失。它还没有绝灭，还远远没有绝灭。我们首席大臣的伪善的政府还在胡作非为，以致《工人代表苏维埃消息报》还是“非法地”出版的，但是，这种愚蠢地企图“禁止”政府所无力干涉的东西，除了给政府带来耻辱，带来新的道义上的打击以外，是什么也得不到的。

当存在着非法报刊和合法报刊的区别的时候，党的报刊和非党报刊的问题解决得非常简单、非常含糊和很不正常。一切非法的报刊都是党的报刊，它们由各个组织出版，它们由各个同党的实际工作者团体有某种联系的团体主办。一切合法的报刊都是非党的报刊，——因为党性是被禁止的——但是它“倾向”于这个政党或那个政党。畸形的联合、不正常的“同居”和虚伪的掩饰是不可避免的；愿意表达党的观点的人被迫说出的含糊其词的话，同那些还没有成长到具有党的观点的人，实质上还不是党的人的人们的考虑不周和思想畏缩，混淆在一起了。

伊索寓言式的笔调，文学上的卑躬屈膝，奴隶的语言，思想

* 本文首次发表于1905年11月13日《新生活报》第12号。

这里“文学”一词，在俄文中原是广义的，包括文学、文献、报刊、出版物等含义。

指1905年10月的全俄政治罢工，后发展为十二月武装起义。

指谢尔盖·尤利也维奇·维特（1849—1915），1905年任沙皇政府内阁总理，10月1日宣言的炮制者，同时提出镇压1905年革命的反革命计划。

《工人代表苏维埃消息报》，是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正式机关报，

上的农奴制——这个该诅咒的时代呵！无产阶级结束了这种使俄国一切生动的和新鲜的事物都感到窒息的丑恶现象。但是无产阶级暂时只替俄国争取到了一半的自由。

革命还没有完成。沙皇制度已经没有力量战胜革命，而革命也还没有力量战胜沙皇制度。我们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到处都看得到公开的、诚实的、直率的、彻底的党性和秘密的、隐蔽的、“外交式的”、狡诈的“合法性”之间的这种反常的结合。这种反常的结合在我们的报纸上也可以看到：不管古契柯夫先生如何嘲骂社会民主党的专横，说它禁止出版自由资产阶级的温和报纸，事实终究是事实，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无产者报》，仍然被摈斥在专制的警察俄国的大门之外。

无论怎样，已经完成了一半的革命，迫使我们大家立刻重新安排工作。现在文学都可能成为、甚至可能“合法地”成为百分之九十的党的文学。文学应当成为党的文学。与资产阶级的习气相反，与资产阶级企业家的即商人的出版业相反，与资产阶级文学上的名位主义和个人主义、“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和唯利是图相反，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提出党的文学的原则，发展这个原则，并且尽可能以完备和完整的形式实现这个原则。

这个党的文学的原则是什么呢？这不只是说，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文学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打倒无党性的文学家！打倒超人的文学家！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一部统一的、伟大的、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作的一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古契柯夫（1862—1936），俄国大工业主，反动的“十月十七日同盟”的头目之一。第三届国家杜马主席。1917年二月革命后，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陆、海军部长。十月革命后逃亡国外。

个组成部分。

德国俗语说：“任何比方都是有缺陷的。”我把文学比作螺丝钉，把生气勃勃的运动比作机器也是有缺陷的。也许，甚至有一些歇斯底里的知识分子对这种比方大叫大嚷，认为这样会把自由的思想斗争、批评的自由、文学创作的自由等等降低了、僵化了、“官僚主义化了”。实质上，这种叫嚷只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人主义的表现。无可争论，文学事业最不能作机械的平均、划一、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这一切都是无可争论的，可是这一切只证明，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的文学部分，不能同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的其他部分刻板地等同起来。这一切决没有推翻那个对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主派是格格不入的和奇怪的原理，即文学事业必须无论如何一定成为同其他部分紧密联系着的社会民主党工作的一部分。报纸应当成为各个党组织的机关报。文学家一定要参加党的组织。出版社和书库、书店和阅览室、图书馆和各种书报营业所，这一切都应当成为党的机构，都应当汇报工作情况。有组织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注视这一切工作，监督这一切工作，把生气勃勃的无产阶级事业的生气勃勃的精神，带到这一切工作中去，无一例外，以此消灭古老的、半奥勃洛摩夫式的、半商业性的俄国原则——作者写，读者读——的一切基础。

自然，我们不是说，被亚洲式的书报检查制度和欧洲的资产阶级所玷污了的文学事业的这种改造，一下子就能够做到。我们远没有想宣传什么清一色的制度或者用几个决定来解决任务。不，在这个领域中是最不能来一套公式主义的。问题在于使我们全党，使俄国整个觉悟的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都认识到这个

即下文所说的“农奴制的书报检查制度”，均指沙皇政府所实行的书报检查制度。

新任务，明确地提出这个新任务，到处着手解决这个新任务。摆脱了农奴制的书报检查制度的束缚以后，我们不愿意而且也不会去当商业性的资产阶级文学关系的俘虏。我们要创办自由的报刊而且我们一定会创办起来，这个自由不仅是指摆脱了警察的压迫，而且是指摆脱了资本，摆脱了名位主义，甚至也是指摆脱了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

最后这一句话似乎是奇谈怪论或者对读者的嘲弄。怎么！也许某个热烈拥护自由的知识分子，会叫喊起来。怎么！你想使文学创作这样精致的个人事业服从于集体呀！你想使工人们用多数票来解决科学、哲学、美学的问题呀！你否认绝对个人的思想创作的绝对自由呀！

安静些，先生们！第一，我们说的是党的文学以及党的文学应受党的监督。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不受任何限制地写他所愿意写的一切，说他所愿意说的一切。但是每个自由的团体（包括党在内），同样也可以自由地赶走利用党的招牌来鼓吹反党观点的人。言论和出版应当有充分的自由。但是结社也应当有充分的自由。为了言论自由，我应该给你完全的权利让你随心所欲地叫喊、扯谎和写作。但是，为了结社的自由，你必须给我权利同那些说这说那的人结合或者分离。党是自愿的联盟，假如它不清洗那些宣传反党观点的党员，它就不可避免地会瓦解，首先在思想上瓦解，然后在物质上瓦解。确定党的观点和反党观点的界限的，是党纲，是党的策略决议和党章，最后是国际社会民主党、各国的无产阶级自愿的联盟的全部经验，无产阶级经常把不十分彻底的、不十分是纯粹马克思主义的、不十分正确的个别分子或流派吸收到自己党内来，可是同样经常按期“清洗”自己的党。拥护资产阶级“批评自由”的先生们，在我们党内，也将要这样做。现在我们的党一下子就会成为群众性的党，现在我们处在急剧向公开组织转变的时期，现在必然有许多不彻底的人（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也许甚至有某些基督教徒，也许甚至有某些神

秘主义者会到我们党内来。我们有结实的胃，我们是坚如磐石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将消化这些不彻底的人。党内的思想自由和批评自由永远不会使我们忘记人们有结合成叫作党的自由团体的自由。

第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先生们，我们应当告诉你们，你们那些关于绝对自由的言论不过是一种伪善而已。在以金钱势力为基础的社会中，在劳动群众做乞丐而一小撮富人做寄生虫的社会中，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实在的“自由”。作家先生，你能离开你的资产阶级出版家而自由吗？你能离开那些要求你作诲淫的小说和图画、描写卖淫来“充实”“神圣”舞台艺术的资产阶级读者和观众而自由吗？要知道这种绝对自由是资产阶级的或者是无政府主义的空话（因为无政府主义作为世界观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思想）。生活在社会中却要离开社会而自由，这是不可能的。资产阶级的作家、艺术家和演员的自由，不过是他们依赖钱袋、依赖收买和依赖豢养的一种假面具（或一种伪装）罢了。

我们社会主义者揭露这种伪善行为，打破这种假招牌，不是为了要有非阶级的文学和艺术（这只有在社会主义的没有阶级的社会中才有可能），而是为了要使真正自由的、同无产阶级公开联系的文学，去对抗伪装自由的、事实上同资产阶级联系的文学。

这将是自由的文学，因为把一批又一批新生力量吸引到文学队伍中来的，不是私利贪欲，也不是名誉地位，而是社会主义思想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这将是自由的文学，因为它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几万上等人”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这将是自由的文学，它要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经验和生气勃勃的工作去丰富人类革命思想的最新成就，它要使过去的经验（从原始空想形式的社会主义发展成科学社会主义）和现在的经验（工人同志们当前的斗争）之间经常发生相

互作用。

工作吧，同志们！在我们面前摆着一个困难的然而伟大的和有成效的新任务：组织同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运动密切地、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广大的、多方面的、多样性的文学事业。整个社会民主主义的文学应当成为党的文学。一切报纸、杂志、出版社等等都应当立即进行改组工作，以便造成这样的情况，使它们根据这些或那些原则完全加入这些或那些党组织。只有这样，“社会民主主义的”文学才会成为真正社会民主主义的文学。只有这样，它才能尽到自己的职责。只有这样，它才能在资产阶级社会范围内摆脱资产阶级的奴役，同真正先进的、彻底革命的阶级的运动汇合起来。

《列宁选集》第1卷，第646—65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纪念葛伊甸伯爵* （节录）

（我国非党的“民主主义者”教给人民什么呢？）

地主葛伊甸伯爵在十月革命以前是一个贵族自由主义者。在人民取得了第一次胜利以后，即在1905年10月17日以后，他毫不迟疑地立刻投入反革命阵营，投入十月党，投入痛恨农民、反对民主的地主和大资本家的政党。这位贵族人物在第一届杜马时拥护政府，在第一届杜马解散后曾洽谈（但没有谈妥）参加内阁。这就是这位典型的反革命地主生平的几个最主要的经历。

这就是衣冠楚楚的、有教养的、受过教育的绅士，他们满口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口口声声同情自由事业，同情农民争取土地反对地主的斗争，实际上这些绅士们在报刊上，在

* 本文刊载于1907年6月《生活之声》文集第1集。

各种社团中、在各种会议和选举中垄断了合法的反对派的地位，就是这些人哭丧着脸向人民传道说：“真是罕有而幸福的命运！……已故伯爵首先是一个人。”

不错，葛伊甸不仅是一个人，而且是一个既善于理解自己阶级的共同利益，又能非常聪明地维护这些利益的公民。而你们这些有教养的民主派先生们，不过是可怜的傻瓜，你们除了做地主阶级的文化奴仆以外还能做些什么呢，但是你们偏要用自由派的装疯卖傻来掩饰自己的无能。

地主对人民的影响并不可怕。他们要使比较广大的工人群众甚至农民群众在比较长久的时期内受他们的蒙蔽，那是永远也办不到的。但是有一些知识分子，他们不直接参加剥削，他们学会了搬弄一般的词句和概念，热中于宣传种种“好的”说教，他们还常常极端愚蠢地把自己的阶级之间的地位作为非阶级的政党和非阶级的政策的原则，——这样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人民的影响是危险的。这样，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毒害广大群众，要同这种毒害作斗争，必须动员社会主义的全部力量。

自由派和民主派的无耻之徒泣不成声地说，葛伊甸是一个有教养、有文化、讲人道和宽宏大量的人，他们还自命是超越于任何“党派”之上，而从“全人类”的观点出发的。

可敬的先生们，你们错了。这不是全人类的观点，而是全体奴才的观点。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与之作斗争的奴隶，是革命家。不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过着默默无言、浑浑噩噩的奴隶生活的奴隶，是十足的奴隶。津津乐道地赞赏美妙的奴隶生活并对和善的好心的主人感激不尽的奴隶是奴才，是无耻之徒。

《同志报》的诸位先生，你们正就是这样的无耻之徒。你们怀着可鄙的软心肠为那位支持反革命政府的反革命地主竟是有教养的

《同志报》是1906年3月至1908年1月在彼得堡出版的俄国左翼立宪民主党人机关报。

和人道的人而感动。你们不明白，你们不是把奴隶变成革命家，而是把奴隶变成奴才了。你们谈论自由和民主，只不过是哗众取宠，是一些陈词滥调，是时髦的空谈或假仁假义。这是一个粉饰得并不高明的假面具。而你们自己就是伪君子。你们的灵魂是卑劣透顶的，你们的全部教养、文化和教育不过是一种熟练的变相卖淫。因为你们出卖自己的灵魂，不过你们出卖灵魂不仅是由于贫困，而且是由于“对艺术的爱好”！

.....

涅克拉索夫和萨尔蒂柯夫曾经教导俄国社会要透过农奴制地主所谓有教养的乔装打扮的外表，识别他的强取豪夺的利益，教导人们憎恨诸如此类的虚伪和冷酷无情。可是，那些参加立宪民主党的，或者成为立宪民主党应声虫的现代俄国知识分子，却教导人民蛮横无礼，夸耀自己非党民主主义者的公正无私；这些人竟自称是民主遗产的保护者。这种情况难道不比杜巴索夫和斯托雷平的劣绩更为可恶吗.....

沙龙民主主义者钦佩得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葛伊甸是“人”。葛伊甸是人道的。

这种对葛伊甸的人道的敬崇，使我们不仅想起了涅克拉索夫和萨尔蒂柯夫，而且也想起了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在我们面前出现一个文明的、有教养的地主，他举止文雅，态度和蔼，有欧洲人的风度。地主请客人饮酒，高谈阔论。他问仆人说：“为什么酒没有温？”仆人默不作声，脸色苍白。地主按了一下铃，轻声地对进来的仆人说：“费多尔的事.....去处理吧。”

请看，这就是葛伊甸或葛伊甸 ■ la “人道”的典型。屠格涅夫笔下的地主，比起萨尔特契哈来.....也是“人道”的人，例如，他是

立宪民主党人在评价葛伊甸时所表现的奴才相，较之《同志报》的先生们更甚百倍。我们把《同志报》的先生们看作俄国“社会”中“正派人士”的“民主主义”的典范——列宁注。

之流。

那样地人道，竟不愿亲自到马厩去看看是否很好地处理了鞭挞费多尔的事。他是那样地人道，竟不关心鞭挞费多尔的棒条是否用盐水浸渍过。他这个地主自己对仆人不打不骂，他只是远远地“处理”，他不声不响，不吵不嚷，又不“公开出面”……真象一个有教养的温和慈祥的人。

葛伊甸的人道也完全如此。他自己没有同卢热诺夫斯基和菲洛诺夫这些人一起参与拷打和折磨农民。他也没有同连宁坎普夫和美列尔 - 扎科美尔斯基这些人一起去进行讨伐。他没有同杜巴索夫一起去枪毙莫斯科人。他是那样人道，竟放弃了诸如此类的功绩，而让全俄国“马厩”中的这类英雄去“处理”，自己却坐在幽静雅致的书斋里领导着拥护杜巴索夫分子政府的政党，让这个政党的领袖们为战胜莫斯科人的杜巴索夫举杯祝贺……。…派杜巴索夫分子去“处理费多尔的事”，自己不到马厩去，难道这还不算人道吗？在主持我们自由派和民主派报刊政治栏的老婆婆们看来，这是人道的典范……。…是连苍蝇也不肯伤害的天大的好人！拥护杜巴索夫分子，坐享杜巴索夫分子镇压的成果，而又不必为杜巴索夫分子负责，这真是“罕有而幸福的命运”。

沙龙民主主义者认为，抱怨葛伊甸分子为什么不管理我们就是登峰造极的民主主义（因为这种沙龙笨伯想不到这是葛伊甸和杜巴索夫分子之间的“自然”分工）。请听：

“……现在，正当他（葛伊甸）最有力的时候，他却死了，这是多么可惜呵。否则他现在会同极右分子进行斗争，发挥他灵魂中良好的素质，以他所固有的毅力和机智捍卫立宪的原则。”（六月二十二日，星期五，《同志报》第299号，《纪念葛伊甸伯爵》，普斯科夫省通讯）

遗憾得很，有教养的、人道的和平革新家葛伊甸，竟没能以自己的立宪词句来掩盖第三届十月党人杜马的真相，没能掩盖专制政体废除杜马的真相！“民主主义者”政论家的任务不是去撕破虚伪的外衣，把压迫人民的敌人赤裸裸地暴露在人民面前，而